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 学术通讯 ——

2010 年 10 月（总第二十四期）



Fud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Social Sciences
— 2010. 10 —

E-mail: ias-fudan@yahoo.cn

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 28 楼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目 录

一、学术成果	4
1. 邓正来教授主编《西方法律哲学书评文集》出版.....	4
2. 贝克、邓正来、沈国麟：《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对话》	10
3. 邓正来教授主持“当代中国发展论丛”重大委托项目第2期成果出版.	10
4. 邓正来主编《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讲演录》第一辑出版.....	12
5. Sujian Guo, Gary Stradiotto: “Transitional Modes of Democratization and Democratic Outcomes”	13
6. 纳日碧力戈教授著作《语言人类学》出版.....	14
7. 刘清平：“A Moral Argument for the Priority of the Right over the Good: A Case Study of the Confucian Ethics,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6
8. 顾肃、刘雪梅译，【美】涛慕思·博格 著：《罗尔斯：生平与正义理论》	16
9. 复旦高研院院刊《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9月（总第32期）出版	18
二、学术讲座	20
1. 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Philippe Schmitter教授主讲“民主化与国家能力”	20
2. 复旦高研院举行第十七期双周学术午餐会.....	23
3. 复旦高研院举行第八次“小南湖跨学科读书会”	26
4. 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Richard Wolin教授主讲“福柯：生命性政治与介入性实践”	28
5. 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David Goodman教授主讲“为何中国没有新的中产阶级？”	31
三、学术会议	35
1. “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哲学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35
2. “全球化时代：两岸社会科学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圆桌会议举行.....	41
四、学术出访	48
1. 邓正来教授应邀到意大利东方大学讲学并出席“全球治理中市民社会的角色”国际学术论坛	48

2. 邓正来教授在第一届亚洲人类学民族学论坛做主题演讲, 纳日碧力戈教授主持第一届亚洲人类学民族学论坛开坛	50
3. “雄楚学坛”正式启动, 邓正来教授亲赴参加	51
4. 邓正来教授应邀参加德国弗莱堡大学高研院举办的世界高等研究院学术论坛	52
5. 邓正来教授应邀参加中欧法学院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	54
6. 纳日碧力戈教授参加在韩国高丽大学举行的国际会议	54
7. 纳日碧力戈等教授参加“边疆发展中国论坛”	55
8. 纳日碧力戈教授在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举办讲座	55
9. 纳日碧力戈教授参加庆祝中国民族学学会成立 30 周年——中国民族学学会第七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学术研讨会	55
10. Philippe Schmitter教授 9 月在吉林大大学、南开大学演讲并参加在南开大学举行的研讨会	56
11. 高研院部分成员应邀参加“世博”澳大利亚国家馆举行的圆桌会议 ..	57
五、学术来访	58
1. 丹麦文化部部长Per Stig Møller一行来访复旦高研院, “文化在当今和未来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研讨会举行	58
六、媒体报道	60
1. 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携两岸学术访问团访问复旦高研院	60

一、学术成果

1. 邓正来教授主编《西方法律哲学书评文集》出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年10月

目 录

自然法学与政治哲学



良好秩序理论的超越：朗·富勒法律秩序观的建构

——兼评朗·富勒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 Order ” 邹立君

走出逻辑的丛林

——富勒《反身自问的法律》简评 王家国

基于渊源的法律效力性判准之批判

——兼评朗·富勒 “Anatomy of the Law” 邹立君

法律的内在道德：一种通达目的性事业的观念

——兼评朗·富勒 The Morality of Law 邹立君

自由主义共同体中的政治正当性建构

——评罗纳德·德沃金《法律帝国》 丁 轶

人权共识与全球多元稳定

——评约翰·罗尔斯《万民法》 徐清飞

价值多元与罗尔斯的理论转向

——评威廉·盖尔斯敦“Pluralism and Social Unity” 李琛

从意见与意志之区分看哈耶克的政治理论

——兼评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三卷 邹益民

分裂的哈耶克：自由的两种论证理路和两种法律观的混淆

——对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一书的文本分析 刘小平

立法的限度

——评哈耶克《理性主义的种类》、《建构主义的谬误》、《两种心智类型》

汤善鹏

“分析的”自然法学

——兼评菲尼斯《自然法与自然权利》 崔灿

从“理性主义”自然法到“意志论”的自然权利

——评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 吴彦

制度何以为凭？

——兼评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 资琳

从“监狱网络”审视权力

——简评福柯《规训与惩罚》 陈媛

微观权力分析

——读福柯《规训与惩罚》 韩平

生命权力、新自由主义与帝国

——论哈特和奈格里“帝国—大众范式”解放旨趣的不彻底性

孙国东

永久和平论还是帝国主义的新宣言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书评

李新安

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帝国，抑或村落？

——评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合著《帝国》 姚选民

社会学法学、法律社会学与法律人类学

社会学法理学的（可能）代价与限度

——从社会整合看庞德《法理学》（第1卷） 孙国东

何种程度上的实用主义？

——读庞德《法理学》（第1卷） 沈映涵

伦理价值的“认同”与“利益”意义

——兼评庞德《法理学》第2卷 邹益民

社会学法理学进路中的法律与道德

——评庞德《法律与道德》 杨晓畅

社会学法理学与封建因素的“联姻”

——简评庞德《普通法的精神》 杨晓畅

社会神中法律人的理性创造

——庞德《法律史解释》读后

洪 建

整合进路中的发展策略：伯克利学派的理论纲领

——兼评塞尔兹尼克与诺内特《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

侯瑞雪

法律社会学中的法律文化概念

——评劳伦斯·弗里德曼《选择的共和国》

李 强

一般法理学如何可能

——评威廉·特维宁“Globalization and Legal Theory” 周国兴

现代社会需要怎样的法律理论？

——评 W. Friedmann《法理学》

刘 岩

功能现实主义视角中的法

——霍贝尔《初民的法律：法的动态比较研究》介评 杨晓畅

追寻“中国”？

——评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

陈 昉

法律实证主义与法律现实主义

“描述社会学”解读

——评哈特《法律的概念》

沈映涵

哈特《法律的概念》的功利主义检讨

——以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为中心 徐清飞

法律实证主义的强立场

——兼评拉兹《法律的权威》 朱 振

作为命令的法律

——兼评约翰·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 甘德怀

卡多佐的社会功利观

——解读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 王虹霞

规则怀疑论者的规则观

——评卡尔·卢埃林《荆棘丛》 刘 剑

可估量性：经由传统而实现的“神话”

——评卡尔·卢埃林《普通法传统》 刘 剑

“基本法律神话”的破灭

——评杰罗姆·弗兰克《法与现代心智》 于晓艺

为什么是行为？

——评 The Bramble Bush: On Our Law and Its Study 周国兴

其 他

法律如何在“社会情境”下存在

——读昂格尔的《批判法学运动》 张翠梅

从传统看伯尔曼的法律观

——评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 于晓艺

立法过时的司法应对

——评卡拉布雷西《制定法时代的普通法》 汤善鹏

“积极权利论”的陷阱

——评史蒂芬·霍尔姆斯等《权利的成本》 孙国东

我们需要一种怎样的历史理解：从自然法思想切入

——评约翰·M·凯利《西方法律思想简史》 崔 灿

新康德主义视角下的韦伯政治思想

——兼评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邹益民

从自由主义民主到世界主义民主

——评戴维·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从现代国家到世界主义治理》

王晶宇

精神分析与自我反思：哈贝马斯对弗洛伊德的批判与借鉴

——兼评哈贝马斯的《认识与兴趣》 龚智慧

2. 贝克、邓正来、沈国麟：《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对话》

《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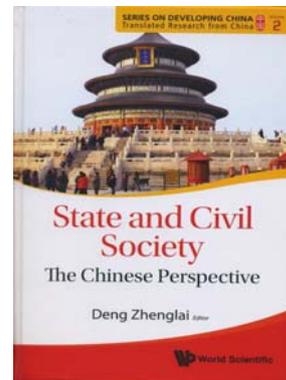
【摘要】这次对话集中讨论了风险社会的诸多特性，如启蒙功能（开启各种替代性现代性的空间）、沟通性的世界主义逻辑（全球语境下的公共协商）及想象的世界主义共同体（通过大众传媒消解想象的“他者”）。正在经历“压缩的现代化”的中国面临着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双重强制”的共时性困境，风险社会或许能够提供一种替代性的社会图景。风险社会通过相互依附性催生了新的革命性力量，并赋权了国家和公民行动。对于社会研究而言，风险社会的意义在于帮助我们了解“方法论国家主义”的局限而代之以“方法论的世界主义”，从而推动社会科学的世界主义范式转换。

【关键词】 风险社会 启蒙功能 世界主义 替代性现代性

3. 邓正来教授主持“当代中国发展论丛”重大委托项目第2期成果出版

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10月

Content



Chief Editor

List of Contributors

Series on Developing China – Translated Research from China Editorial Committee

Preface

Paying Attention to Chinese Interpretations

Pan Shiwei

Introduction

Academic Inquires into the “Chinese Success Story”

Deng Zhenglai

Chapters

4. 邓正来主编《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讲演录》第一辑出版

商务印书馆，2010年10月第1版

内容简介

本书为“中国深度演讲高级讲坛”（2008-2009）大部分讲演稿的结集。其中收录了石之瑜、王铭铭、赵鼎新、曹锦清、许纪霖、黄玉峰、乔尔·K. 卡西欧拉、王逸舟、沈志华、林尚立、姜义华、马戎十二位国内外著名学者的精彩演讲。从中可以见出他们就政治学、人类学、教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前沿问题所做的研究和思考。



论坛简介

“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设立的常规性品牌论坛之一。该论坛践行“根据中国，走向世界”的学术理念，以新的互动平台引领中国学人加强对当下中国的深度理论研究并推动这种研究走向世界。希望通过邀请世界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名学者主讲、评论与提问相结合的讲演，将该论坛建成推动以中国深度研究为旨趣的社会科学成果“走出去”的最重要平台。

目 录

石之瑜 三叉路口 —— “天下”与“亚洲”对当代中国研究的挑战

王铭铭 “三圈说” —— 中国人类学汉人、少数民族、海外研究的学术遗产

赵鼎新 春秋战国的“国际关系”和中国的统一 —— 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曹锦清 论中国的研究方法

许纪霖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政治正当性

黄玉峰 “人”是怎么不见的——对基础教育存在若干问题的思考

乔尔·K. 卡西欧拉 现代性的儒学化与儒学的“当代化”

——21 世纪的中国发展与儒学绿色政治理论

王逸舟 新时期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

沈志华 冷战国际史研究及其在中国的表现

林尚立 国家在社会转型中的民主反应——基于中国民主化经验的考察

姜义华 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及其路径的独创性

马 戎 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

5. Sujian Guo, Gary Stradiotto: “Transitional Modes of Democratization and Democratic Outcom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World Peace, Vol.27, No. 4, 2010

【首段】How do mode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ffect a country’s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for consolidation? Studies on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re divided in their view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mode of transition 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Transitions are the necessary precondition to creating a democracy, but do they have lasting consequences and help us understand if a new democracy will survive and eventually consolidate?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the mode of transition on democratic success, we examine in greater detail an important question in the democratization literature: do modes of transition 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matter (Munck and Leff 1997)? In order to determine whether transitions matter we construct two complimentary questions. First, does the way in which state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affect democratic quality? That is, do certain types of transitions result in a more rapid democratic deepening than others? Second, is democratic duration a function of transitional modes? Are some modes of transition more likely than others to result in a reversion to authoritarian rule? The bifurcation of these issues is important since duration is not synonymous with quality and some democracies achieve a rapid deepening despite being democratic for only a few years.

6. 纳日碧力戈教授著作《语言人类学》出版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17日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语言人类学定位

第二节 形式、内容与意义

第三节 语言：能动和历时的象征活动

第四节 语言：指号系统

第二章 作为文化资源的语言：普遍性和相对性

第一节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第二节 结构与认知

第三节 语言的文化隐喻

第四节 时间和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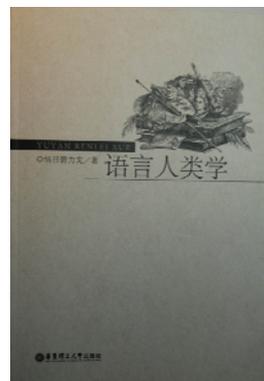
第三章 语言的由来

第一节 达尔文的进化论

第二节 从猿到人

第三节 人脑和语言

第四节 人类语言和动物语言



第四章 语言和实践

第一节 结构耦合

第二节 说话民族志

第三节 语言和行动

第四节 文化的翻译活动

第五章 文字的力量

第一节 关于文字的起源

第二节 文字和语言

第三节 文字的作用

第四节 超越文本

第五节 汉字文化的影响

第六章 重归语言人类学

第一节 游戏与规则（维特根斯坦）

第二节 对话理论和社会行动理论（巴赫金、维高茨基）

第三节 “指号三性”（皮尔斯）

第四节 “移动符”（雅各布森、西尔弗斯坦）

第五节 认知语言学

第七章 语言和全球化

第一节 数字化生存

第二节 文化交流和语言接触

第三节 语言意识形态

第四节 现状与发展

7. 刘清平：“A Moral Argument for the Priority of the Right over the Good: A Case Study of the Confucian Ethics,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Springer. Vol. 15, No. 3, September 2010

Abstract The Paradox of Confucian ethics in prioritizing filial piety over humane love can show that only the good of right, which is encapsulated in an age-old precept “harm no one and benefit fellow humans” as well as in a modern principle “respect the deserved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every human being,” is the ultimate good and should trump any other goods in human life. In cases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good of right and other goods, therefore, one should give up other goods for the good of right. Otherwise, the result will be an ultimate evil: doing substantive harm to human beings or infringing upon the deserved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human beings.

Keywords Right, Good, Priority, Confucianism, Paradox, Critical Humanism

8. 顾肃、刘雪梅 译，【美】涛慕思·博格 著：《罗尔斯：生平与正义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13日

目 录

第1章 生平

- 1.1 家庭和学校教育
- 1.2 大学和战争时期
- 1.3 学术生涯
- 1.4 动荡的十年：1962—1971年
- 1.5 《正义论》之后
- 1.6 罗尔斯研究工作的意义

第2章 对基本结构的关注

- 2.1 理论的缘起
- 2.2 现代社会的复杂性
- 2.3 重叠共识的理念
- 2.4 理论范围



第3章 关于正义的最高层标准

- 3.1 纯粹接受方导向的正义标准
- 3.2 匿名条件
- 3.3 基本利益对幸福

第4章 基本理念：作为公平的正义

- 4.1 原初境况
- 4.2 最大最小对平均
- 4.3 基本益品
- 4.4 基本自由的词典式优先性

第5章 第一个正义原则

- 5.1 基本权利的结构
- 5.2 阐述所要求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安排
- 5.3 基本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
- 5.4 基本自由可允许的减少
- 5.5 基本自由不可允许的减少

第6章 第二个正义原则

- 6.1 初步近似意义上的差别原则
- 6.2 差别原则详述
- 6.3 原初境况中的差别原则主张
- 6.4 机会原则
- 6.5 倡导原初境况中的机会原则
- 6.6 一种私有产权下的民主

第7章 一个罗尔斯式的社会

- 7.1 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
- 7.2 一种正义的政治观念
- 7.3 政治的对广包的自由主义
- 7.4 一个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正义观念
- 7.5 罗尔斯的观念所调整的良序社会
- 7.6 一个比较现实的见解

第8章 关于证成

- 8.1 反思的平衡
- 8.2 基本理念
- 8.3 真理与合理性

第9章 对“作为公平的正义”的采纳

- 9.1 罗尔斯与自由至上主义

9.2 罗尔斯与社群主义

9.3 罗尔斯与康德

结论

附录

索引

译后记

9. 复旦高研院院刊《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9月（总第32期）出版

目 录

2010年9月（总第32期）

卷首语：重新发现中国.....邓正来

主题研讨 重新发现中国（七）

袁志刚 解栋栋：土地资本化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转型

刘建军：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演进的内在逻辑——以中国知识群体的“当代特质”及其“介入机制”作为研究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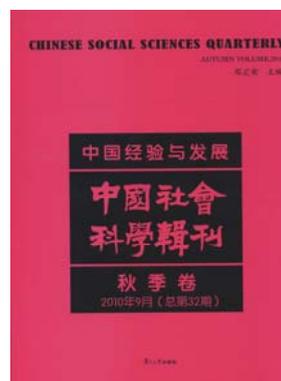
邓大才：粮改三十年：农民、市场与国家的博弈与利益重构——改革30年“四次大粮改”的前因后果

冯志锋：政治学的博弈和博弈的政治学——一项对77本政治学基础类教材进行调查研究的分析报告

学术专论

方 钦：《财产权利的理性化与神圣化》

高 毅：法国式革命暴力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姜 朋：中国博士后制度的源起与变迁

李月军：反思与进展：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制度变迁理论

王建勋：税收、同意与宪政的起源：兼论中国税制改革的基本原则

肖 超：由“再现”走向“显现”——以德尔图良《护教篇》为基础对早期基督教历史观念路径的探询

学术对话

拉兹、邓正来、朱振：道德与政治哲学视野中的法律哲学——拉兹与邓正来、朱振之间的学术对话

学术综述

章 可：“人文主义”的诞生：一个概念史的研究

张 芬：健康、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研究综述

海外专论

格雷姆·默多克，洪宇等译、曹晋校：数字经济与公众文化

克里斯托弗·J 贝里，方钦译：亚当·斯密的道德经济学

理查德·伯恩斯坦，孙国东译：《哈贝马斯与现代性》导言

书评思考

李祥生：资本主义的自我实现精神——评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王俊生：大国何以和谐相处？读《世界是不确定的：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稿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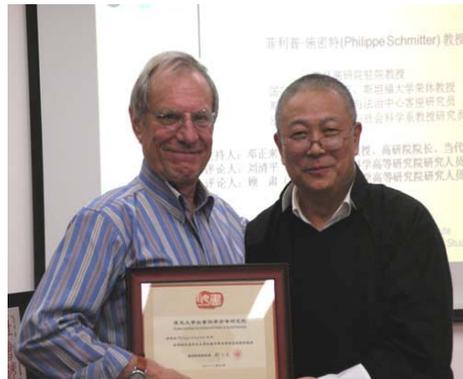
二、学术讲座

1. 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Philippe Schmitter 教授主讲“民主化与国家能力”

2010年10月14日晚上6:30,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通业大讲堂”举行了第二十八场讲座。

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驻院教授, 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 斯坦福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客座研究员, 欧洲大学学院政治与社会科学系教授研究员, 国际著名政治学家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与顾肃教授担任评论嘉宾。复旦大学高研院研究人员陈润华、孙国东、吴冠军等也参加了本次讲座。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校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主持了讲座。他对施密特教授来复旦高研院“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演讲表示了诚挚的欢迎, 简要介绍了施密特教授的学术背景与学术专长, 并分别介绍了本次演讲的评论嘉宾刘清平教授与顾肃教授。



在正式演讲开始之前, 邓正来教授代表高研院向菲利普·施密特教授颁发了“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驻院教授”的聘书。接着, 施密特教授为大家带来

带来了题为“民主化与国家能力”(Democratization and State Capacity)的讲演。



菲利普·施密特教授指出, 自1974年以来, 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在政治体制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其中一些国家在正在向民主化(democratization)迈进。他的研究所关注的正是这种民主化进程对于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影响。

首先, 施密特教授对其研究变量进行了说明。在研究中, 他将“国家能力”作为自变量, 将“民主化”作为因变量。同时, 施密特教授指出, 国家疆域(state territory)、国际环境(inter

national circumstance)、物质资源(material resources)和合法性(legitimacy)是影响国家能力的重要因素;由于各国情况的不同,国家能力作为因变量具有相对性(relative quality)。

接着,施密特教授阐述了其研究的理论视角。他指出,对于民主化与国家能力的关系,当今学界存在两种相对的理论视角:一种是自由主义的理论视角,其认为伴随着民主化的进行,民众和社会团体更倾向于通过个体而非公共的方式来获取资源。从而,民主化降低了民众对国家能力的需求。另一种则是保守主义的理论视角,其认为民主化程度越高,民众对国家能力的需求越高。施密特教授指出,他的研究正是围绕“民主如何影响国家能力”这一问题的一般理论视角来进行实证研究,试图找寻问题的真正答案。

基于大量详尽的图表与数据分析,施密特教授向大家展示了其分析的具体路径。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施密特教授指出,民主和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虚假关系(spurious relation,其关联是由第三个变量“发展/现代化”(development/modernization)引发的。因此,要使用统计方法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对“发展/现代化”(development/modernization)这一变量进行控制。在研究中,施密特教授重点对那些经历了从传统共产主义集权制度向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转型的国家(如俄国和匈牙利)进行了追踪观察。同时,针对现有研究中忽视“国家将资源转换为国家能力的效率”这一变量的倾向,施密特教授在其研究中特别添加了两个影响因素——犯罪和腐败。施密特教授指出,这些国家在政治转型中民主化能力都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趋势:即先下滑,而后再上升并渐趋稳定。同时,在这种大的共同变化趋势之下,还存在着两种极端类型的区别:一类国家采取“休克疗法”(shock treatments),造成国家能力急剧变动,表现为“眼泪之谷”(the valley of tears)般的波动趋势;另一类国家则通过沟通、协商,国家能力变动相对缓和。

最后,施密特教授对其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伴随经济发展,国家能力倾向于呈现增强态势,这种态势在民主政治制度下尤为明显;在那些经历了专制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的国家中,民主制度巩固地越迅速,国家能力增强地成效就越大;近年来共产主义国家向民主制度转型的案例中,民主和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相对地十分不明朗。这一方面是因为巩固后起的民主制度更加地困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变革之初国家能力的下滑表现地更为急剧。

评论嘉宾刘清平教授高度评价了施密特教授的研究。他指出,施密特教授运用大量的统计数据和方法针对民主转型国家进行了追踪研究,分析了民主化和国家能力之间的关联,其结论很有启发性。



刘清平教授非常认同施密特教授关于经济发展、民主和国家能力之间关系的分析结论，并列举了一些实例进行佐证。在对其研究给予肯定的同时，刘教授结主要从“善”（good）与“正当”（right）关系的角度对施密特教授进行了商榷。他认为，施密特教授关于民主制度增强国家能力以及其关于“善治”（good governance）的一些看法，更多地是强调“善”的一面，而对“正当性”的关注相对较少。他强调：民主不仅是一个好东西（good thing），而且首先是个对的东西（right thing）。同时他认为，施密特教授偏重于从抽象的角度来评价国家能力，相对忽视了国家能力在不同政治制度下的“善”与“正当”。在此基础上，刘清平教授指出，在对国家能力和“善治”的研究中，只有同时考虑到“善”与“正当”，才能做到更为全面、更有说服力。



评论嘉宾顾肃教授在对国内的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基础上他指出，施密特教授对民主化与国家能力问题所进行的长期跟踪经验研究对目前的国内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顾教授建议，在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越来越为世界瞩目的情况之下，施密特教授也应该将其作为一个典型来进行研究，这对于丰富“民主化与国家能力”关系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顾教授提出，施密特教授在分析过程中，对于结论的原因说明的还不够；他强调，经验研究应该在原因分析上做出更多努力，不然，读者所看到的的就只是些描述性的东西。最后，顾教授特别指出，当前中国的发展面临着模式选择的问题，施密特教授对自由民主模式、社会民主模式、保守主义模式和怀旧主义模式的分类研究对中国的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围绕两位评论嘉宾的点评，施密特教授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理解与感悟。针对“善治”的问题，他认为，在政治制度的转型过程中，规范应被置于权利之上；权利无法做到自我实现，只有借助于好的规范才能够解决各种意见分歧、最终促成权利的实现。在政治制度的模式上，施密特教授认为，实践中很多国家的模式都是一种混合状态（hybrid），而非纯粹的民主或者非民主状态；对这种混合模式进行价值判断必须结合具体的时空环境。施密特教授特别讨论了中国案例的特殊性，对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动机与诱因研究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在接下来的讨论与提问阶段，现场的老师 and 同学们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主要包括：文化在发展、民主化和国家能力的关系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研究中应

如何处理文化因素的作用？如何看待伊拉克民主进程的未来？有没有考虑过加入其他变量或进行相应的定性研究，以解决目前的研究结论只适用于那些经历了从共产主义集权制度向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转型的国家的局限性？民主的核心要素是什么？等等。



施密特教授对大

家的讨论和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他指出，要考察文化的作用必须首先对文化的概念进行区分。他认为，存在着两种类型的文化，一种是作为区别国家和地区的独特文化，另一种则是全球化、现代化过程中日益融合的普遍性文化。

在关注文化差异性的同时不能忽视其普遍性。具体到发展、民主化和国家能力的研究，首先要关注“发展”这一要素，在此基础上如果解释力仍不足，则可以进一步考察文化差异的影响。在伊拉克的民主进程问题上，施密特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供大家思考：外国力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一个国家的民主进程？民主的推进能够通过武力来实现吗？对于其研究结论不能解释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现象的局限性，施密特教授表明，自己的研究主要是为了获得一个一般性的理解，而中国和印度实际上属于比较特殊的情况。要突破研究结论的局限性，可以采取非集计型（disaggregate）的方法，对中国和印度这样的特殊个体进行单独考察，将文化、宗教等因素都考虑进去。对于民主的核心要素，具体到与国家能力的关系来看，在资源的收入渠道上，它能够促使民众自愿纳税、交纳资源；在支出方面，民主及其伴随的监督机制能够使国家合理支出资源、满足民众需要。

讲座最后，邓正来教授对菲利普·施密特教授的精彩演讲和广大同学的积极参与表示了感谢。据悉，施密特教授已于2010年9月6日和9月24日分别在吉林大学和南开大学进行了两场演讲，此次在复旦大学的演讲是其在中國高校巡讲的第三站，11月初他将赴浙江大学进行第四场演讲。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王晨丽 / 文)

2. 复旦高研院举行第十七期双周学术午餐会

2010年10月18日中午12:0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在光华楼东主楼2812室高研院“思想者学苑”举行第十七期跨学科双

周学术午餐会。本期围绕着“构成‘新闻民工’概念的语境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提出此概念的正当性”的问题进行了非常有趣的对话。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出版研究中心副主任曹晋担任主讲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青年学者、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杨典应邀参加学术午餐会。本次学术午餐会由邓正来教授主持，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吴冠军、孙国东、陈润华、沈映涵等参加了此次学术午餐会。

邓正来教授首先代表高研院向曹晋教授和杨典博士的出席表示欢迎，并向两位嘉宾介绍了其他出席餐会的各位高研院研究人员。

曹晋教授首先将“新闻民工”设定为一种身份概念，是对新闻工作者在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从文化事业身份下降到全职临时工身份的隐喻，前者处于充分享受国家医疗，住房等配置型福利的优势状态，而后者无论是福利还是职业前景都完全处于不确定性状态。



然后，曹教授从三个层面分析构成这个概念的语境：从微观层面讲，构成“新闻民工”的要素是，文化事业单位依照“微软”原型转化为企业单位以寻找更大的利润空间，其中尤其是用弹性雇佣制度取代终身制，以节省人力资源成本的方式来增加利润，结果确实实现了企业增加收益的目的，但是对雇佣者个人而言获得了“不期许”的自由，从终身员工沦落为长期短工；从中观层面讲，媒体用工制度的改革，实施集团化，但此举不是依照市场规律，而是由行政命令作出规定，其结果造成人们不再对集团化的正当性进行反思，使“新闻民工”的兴起顺理成章；从宏观层面讲在市场经济转型，福利全面的市场化的情况下形成了中国新工人阶级，由于失去了社会安全保障，缺乏法规保障和不可依靠工会，中国工人由此丧失了主体性，去权利化，造成当代中国媒体工作者“政治淡漠”、“对未来前景不看好”、“更加依附权力”、“无抵制意识”，这些都是“新闻民工”典型的特征。

结合国际学者对工人群体的研究，曹教授进一步指出，与“新闻民工”相应，北美具有“知识劳工(knowledge worker)”的概念，它源于国家媒介经济增长与员工收入降低的悖论情境，而在中国，对“新闻民工”的剥夺源于市场经济商

品趋势与行政命令的残余霸权，这种剥夺被“民主化”，甚至打造“新闻民工”受到普遍认可。就市场经济转型而言，打造它们的途径就是“弹性雇佣制度”，劳动力商品化的制度被贯彻得十分彻底；但与北美不同的是，社会安全网络荡然无存，这是中国行政命令霸权造成的；在经历了诸多剥夺环节之后，中国的“新闻民工”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下滑阶层”。由此，曹教授希望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转型进行深刻反思。



在曹教授提出自己的观点之后，杨典博士从美国“由管理资本主义向投资资本主义转型”对中国大企业重组影响进一步解释“新闻民工”形成的权力背景。他指出，前者以“高层管理者”掌握企业实权，后者则是由“投资者”掌握大公司的控股权，因而两者有不同的利益导向：前者要“控制整个经济命脉”，后者要有“高回报率”，致使关注长远导向的大公司不得不关注受益，减少研发成本和人力资本，使企业的并购整合与劳动力权力下降，管理者压缩劳动者利益成为趋势。同时以追求高利润为导向的资本主义造成“民工”现象往往从高科技产业开始，这些也会成为沿袭美国公司模式的中国将要趋向的情境。基于此，杨典博士向曹晋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鉴于中国其他战略行业，中国新闻行业的独特性在哪里？哪些制度可终结中国“新闻民工”现象？

高研院研究人员们也在弹性雇佣制度对新闻自由的影响，提出“新闻民工”概念的正当性向曹晋教授提出了问题，主要包括：弹性雇佣制度是否为新闻自由提供契机？中国文化产业离开了国家需求是否还能存在？用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阶级分析”框架来分析中国当下的“新闻民工”现象是否正当？如何究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展开“阶级分析”？对“新闻民工”概念的这种分析如何应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质疑？对“新闻民工”概念的正当性是否可在这两个角度上予以证明：从历史的角度看未能兑现“工人主体性”承诺，从结构性的角度看反



映当下社会转型中的结构性问题？曹晋教授不仅对上述问题做出一些回应，而且更加欣然接受各位研究人员所提出的研究建议。

邓正来教授最后也论述了自己的看法：“新闻民工”现象透视出中国在用非经济逻辑的方式来解

决经济问题，因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承诺在当下仍然存在，所以“新闻民工”不是历史的问题。他进一步指出：从“新闻民工”现象透视出的中国问题依旧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承诺与国家现代化诉求的内在紧张；而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框架内，中国人运用其“生存性智慧”解决各种问题。令人遗憾的是，在目前诸个案研究中能够找到这种问题意识的研究不多。他强调：在个案研究中，保有何种关于中国之理解的前提是至关重要。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王卓娅/文）

3. 复旦高研院举行第八次“小南湖跨学科读书会”

2010年10月19日星期日晚上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通业大讲堂举行第八次小南湖跨学科读书会。本次读书会的阅读文本为：[美]查尔斯·拉莫尔：《现代性的教训》，刘擎等译，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受邓正来教授委托，复旦大学讲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人员孙国东博士主持了本次读书会。



本次读书会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丁轶担任主报告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任崇斌担任主评论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陈乃华提交了作为主评论的书面报告。来自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博士生王升平、刘依平、姚选民、李新安、陈媛以及硕士生龚智慧、王中原、杜欢也参加了本次读书会。

主报告人丁轶做了题为“政治中立性、政治自由主义与政治联合——读拉莫尔的《现代性的教训》”的报告，对拉莫尔思想的平等尊重原则、自由主义本质、人性观、政治中立性理论以及政治自由主义在整治联合方面的功效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他指出，拉莫尔所借助的平等尊重原则是一种具有历史偶然性来源的规范，这种过程上的特性无法保障它在我们道德推理中所具有的基础地位；他所谓的生活形式和传统实质上是一种自由主义式的。而且，他的政治中立性理论预设了一个康德式的人性观。无论拉莫尔怎样解释，平等尊重都对他所批评的自主性具有强烈的依赖，因而，拉莫尔版本的政治中立性理论无法达到对所有有争议的理想

的绝对中立，他的道德认识论已经将康德的个人自主性推向了一个极端。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单纯依赖这种平等尊重规范所建立起来的政治自由主义无法在当今这样一个存有合理分歧的社会中起到保障政治联合和政治团结的作用，我们需要采纳一种塔米尔意义上的那种“语境化的个体”的观点，并且，建基于这种人性观基础上的自由民族主义或许才是我们寻求政治联合的恰当出路。



主评论人任崇斌做了题为“政治自由主义的拉莫尔版本——评丁轶《政治中立性、政治自由主义与政治联合——读拉莫尔的〈现代性的教训〉》”的报告。在该报告中，他指出，拉莫尔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放弃理性论证，求助于西方当下社会政治现状（用拉莫尔的话说是生活方式）的自由主义理论。通过历史情境为提供政治自由主义提供道德基础的尝试是薄弱的，他的政治自由主义所依赖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原则能否为有着合理分歧的人们提供政治联合也是成问题的。施密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的核心似乎并没有为拉莫尔所理解，施密特的理论可能会提供一种相对于自由主义的补偿性视角。

主评论人陈乃华博士在其所提交的书面报告“拉莫尔《现代性的教训》评议”中，首先肯定了丁轶的分析，认为拉莫尔的政治自由主义是一种“非中立的政治自由主义”。她指出，拉莫尔眼中的政治自由主义之道德基础的平等尊重并不像他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普遍性和中立性。而且，普遍道德在拉莫尔看来无疑就是理性对话和平等尊重，因为它们都是为政治中立性辩护的，是我们目前生活形式和传统的体现。因此，拉莫尔实际上所指涉的生活形式和传统无疑就是自由主义的生活形式和传统。接着，陈乃华博士对“政治中立性”进行了分析。她指出，“政治中立性”概念与自由主义，意味政治对人们平等一视同仁，对于各种价值、信仰追求具有一种中立、不偏移的立场和态度。在报告的最后部分，陈乃华博士对与拉莫尔思想紧密相关的康德政治哲学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和分析。

接着，姚选民、王中原、王升平、刘依平、龚智慧、李新安、陈媛等七位报告人依次做了八分钟发言。随后，大家就以下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拉莫尔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想究竟能否能够起到保障政治联合和政治团结的作用？拉莫尔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想能否被视为诸多思想流派争斗的一分子？拉兹和拉莫尔的

自由主义思想有何不同？应如何看待拉莫尔的问题意识？如何来正确认识拉莫尔的道德认识论？等等。



在讨论过程中，主持人孙国东博士针对主报告人和主评论人的发言提出了几点建议。他指出，主报告人丁轶最后关于“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论述过于简单。就“民族主义”而言，可以区分为两种：一种是文化不可替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一种是文化优越论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只有前一种民主主义才可以在一个更大的共同体内获得辩护。同时，他也给主报告提了一个问题：拉莫尔试图调和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学术努力与拉兹至善论自由主义有何异同？同时，孙国东博士特别指出，主评论应该以主报告的论述为中心，不能偏离主报告自说自话。他还对每一位被告人的发言进行了简要点评。最后，在场的老师和同学就拉莫尔开放出来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王晨丽/文）

4. 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Richard Wolin 教授主讲“福柯：生命性政治与介入性实践”

2010年10月26日晚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第二十九次讲座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2801室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

本次讲座由国际著名左翼思想家、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教授（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 教授担任演讲嘉宾，发表了题为“福柯：生命性政治与介入性实践”（Michel Foucault: Biopolitics and Engagement）的演讲。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余碧平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吴猛博士担任评论嘉宾。复旦大学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顾肃主持了本次讲座。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吴冠军、孙国东、陈润华、林曦出席了本次讲座。

顾肃教授欢迎理查德·沃林教授来到高研院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演讲。他向在场的听众介绍了 Wolin 教授的学术经历, 研究论著以及他的思想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 并介绍了两位评论嘉宾。



沃林教授的论题取自他新近出版的著作《东方之风：法国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以及 1960 年代的遗产》（*The Wind from the East: French Intellectuals, May '68,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旨在对引发福柯从结构主义者转变为激进知识分子的普遍叙事背景（20 世纪 60 年代的全球性政治暴动，尤其是 66 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和 68 年巴黎五月风暴）进行研究。他强调：这是因为历史从未远离我们，只有懂得了历史的意义才能解决当下的问题。68 年巴黎五月风暴起因于以学生为代表的法国年轻的一代反对法国戴高乐政府的独裁统治，改变腐朽的政治秩序，但运动结束后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究竟建立怎样的政治秩序。在感到其他选择（例如共和国制度，社会主义政党，东欧马克思主义）被阻塞之后，中国文化大革命和毛主义受到法国激进青年，尤其是法国共产党左翼青年的青睐。其实，他们对当时的中国了解甚少，但仍努力为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提供机会。

沃林教授紧接着阐述了 68 年 5 月风暴对福柯思想转变的影响。在此事件发生之前，福柯的思想可被解释为“结构主义”。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还有罗兰·巴特和雅克·德里达等，其认为事件不会发生，决定文化、法律和上层建筑的是内在深层的结构。但是 68 年发生的五月风暴事件不仅彻底打破了这种结构主义的解释，因为它与马克思主义（如果以“经济基础”作为那种深层结构的话）不相符，这表现在领导运动的主体不是工人而是学生。而且，沃林教授进一步指出，这种转变促使福柯转向对“权力”进行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他指出，在 68 年 5 月风暴期间福柯在突尼斯教书。他从自己的朋友那里获悉法国当时的情势后马上返回巴黎，并且成为梵森大学哲学系主任，邀请一些激进的毛主义者，例如：Alain Badiou, Jacques Rancière, André Glucksmann, 和 Jacques-Alain Miller, 来系内任教，以至于警察局曾一度猜测他是毛主义者。从 68 年 5 月风暴中福柯深刻意识到“政治”的含义在不断被扩展，既不可被还原为“阶级斗争”也不可被还原为倡导消极自由和公民自由的资产阶级理念，而是将知识型权力机制转变成一种特殊的制度性实践的方式：亦即实现监禁，人口控制和中立的科学的

分类方法的技术——规范的 VS 非规范的，偏差 VS 一致等。1970 年福柯被任命为法国最权威学术机构——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的教授。在此期间，福柯成为政治上的激进分子，帮助建立了“监狱信息组”（Prison Information Group, GIP）为因五月事件而被关押的毛主义者提供主张他们要求的途径；并且深受毛主义者革命精神和深入群众的探究策略的影响。这时，他提出了“谱系学”、“生命权力”和“规训的社会”等概念，并最终提出了“微观权力”的概念，成为其后其思想的重要标志。因此，“权力”在福柯那里不再是压制、拒绝，而是生产性的，是一种社会控制机制，对身体、道德观和思考方式产生可识别的、积极的影响。

最后，沃林教授从福柯后期思想转变和政治介入中得出结论说：不再有所谓马克思主义和海德格尔主义，历史发展中不存在必然性，历史中存在的是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以及创造新时代的机遇。



评论嘉宾余碧平教授高度评价了沃林教授的研究进路，令余教授印象深刻的是沃林教授把福柯的思想放入到 68 年五月风暴的背景下进行探究，并且用事实证明沃林与中国文化大革命之间的关联。此外，余教授指出福柯的权力概念不是在马克思的权力概念，而是建立在欧洲文化层面上的“微观权力”，它处处存在，使得知识分子扮演着将权力释放于各处的角色。最后，余教授向沃林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疑惑：权力概念与微观权力概念之间的基本差异是什么？

评论嘉宾吴猛博士对福柯的介入概念作出了分析，并且指出沃林教授所提到的 GIP（“监狱信息小组”）是福柯重要的政治活动，为沃林从考古学转向系谱学奠定基础，并且为他讨论权力提供了新的视角，即从马克思转向尼采。然后吴猛博士向沃林教授追问：基于他对福柯中晚期的思想脉络梳理，福柯为何还要选择政治介入？在吴猛博士看来，如果以反对独裁统治为由则过于简单，根据德勒兹（Deleuz）的看法，这种政治介入应被视为“一种新的真理诞生”，



即由意向发出者与意向对象所作出的共同决定，因而不再能以宏观的政治来思考社会政治权力；也许更有意义的是，结合哲学背景，尤其是马克思的思想来解释福柯后期的思想。

沃林教授对两位嘉宾的评论表示感谢，并且对“微观权力”、“知识-权力”概念和福柯的政治介入作出深入解析，对他之所以选择这种研究进路作出解释。在接下来的互动和讨论环节中，对现场老师和同学提出的关于福柯思想中的“Bio-（生命性）”问题等一一做出回应。



最后，顾肃教授对本次讲座做了总结，并希望中国的思想家们能够认真总结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当下的政治情势所产生的影响，从而产生中国的“福柯”和中国的“萨特”。讲座最后，顾教授再次感谢沃林教授为高研院带来一场难得的思想盛宴。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王卓娅/文）

5. 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David Goodman 教授主讲“为何中国没有新的中产阶级？”

2010年10月21日晚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第三十七次讲座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2801室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

本次讲座由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政治学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David Goodman 教授担任演讲嘉宾。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任远，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郭定平担任评论嘉宾，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孙国



东、陈润华出席了本次讲座。

邓正来教授欢迎 David Goodman 教授来到高研院中国社会科学高级讲坛演讲。他向在场的听众介绍了 Goodman 教授的学术经历和研究领域，并介绍了两位评论嘉宾。David Goodman 教授发表了题为“为何中国没有新的中产阶级？”（The New Rich in China: Why there is no new middle class）的演讲。



Goodman 教授首先以他自己的学术经历讲述了研究中国的外国社会学家们总是会用来自于自己生活经验的概念来看中国和理解中国，从而得出结论说，在中国发生了和在他们那里一样的事儿，但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不可靠的，不能理解在中国真正发生的事情；而今天所要讨论的“Middle class”（以下暂译为“中产阶级”）正是这样一种概念。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会预设，在中国，那些在零售、制造、服务等行业中以大小不等的规模，通过发明、投资、拥有、管理等方式获得了不等程度的财富的各类新兴的企业家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从而将中国七十年代末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欧洲自十九世纪初开始并经历了更为长久过程的工业化的结果相等同。但是，Goodman 教授指出，以寻找概念上的相似性理解中国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寻找概念上的差异。

Goodman 教授提出，外国学者们一般将复杂的“中产阶级”概念归于两个普遍但又是由历史决定的定义：资产阶级和（分开的）现代国家的管理者；具体而言，前者在地位上处于普通市民与拥有土地的贵族之间，他们在经济上推动工业化，而在政治上于体制之外扩大了公民权并推动了自由民主进程；后者在地位上处于控制资本与管理国家之间，他们在经济上为生产方式服务，在政治上同样于体制之外发展大众社会、大众政治以及福利国家。虽然在中国新型企业家的出现已很清楚，但为了防止对中国社会变革过程解出并不存在的意义，Goodman 教授提出了本次演讲的问题，即这些新富在多大程度上与其他更早的社会经济环境下的中产阶级相当？经过实证的探究，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中国可能有中产阶级，但是中国新型富有的企业家因为与社会地位、经济财富和政治权利的关系表明他们可能不是新的中产阶级。

接下来 Goodman 开始为自己的设想给出根据：首先，根据对中国现代化历史的研究，中国三次现代化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中产阶级，抑或处于策略性决策

者和第一线生产者之间的，负责国家管理，协调社会生活，而且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管理经济的，是为新国家服务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而非 1978 年开始的经济改革产生的企业家们；其次，根据教授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对中国的一系列企业家调研的结果，发现新企业家占有相当多的财富，与普通人的平均收入差距甚远，因而不能代表全国人口的收入中段；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根据，新富们与党政之间在结构上和联络上的关系：新富们既非独立于政治体制也非被排除在政治体制之外，相反，政治体制积极想要吸纳他们，在本质上区别于中国之外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与政府的关系：他们完全独立于政治体制，进而引申出其他重要的区别，例如企业控制权并非完全归企业家所有等。

评论嘉宾郭定平教授高度评价了 Goodman 教授的这项实证研究，同样是对新富问题的研究，郭教授首先从政治学的角度作出分析：政治学关注的问题是中产阶级对国家现代化，民主政治的发展起到什么作用？目前中国对中产阶级的定义不一，为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不同于 Goodman 对中产阶级的宽泛定义，郭教授将中产阶级定义为私营企业家，在 80-90 年代中后期，私营企业主成长很快，同时对政策的满意度下降，致使中央提出三个代表政策，对私营企业主敞开政治的大门，根据罗伯特达尔提出的走向民主的两个重要标准-参与与竞争，中国在这两个方面的政治变化显示出中国进行了有效的政治改革，驳斥了那些否定中国有重大政治改革的人；其次在中国新富阶级与党政关系方面，郭教授提出了与 Goodman 教授不同的观点：由于中国政治体制的不完善，中国第一批中国的新富阶级一直处于体制之外，直到后来许多党员下海才使得新富阶级的成分发生了变化，显示出不同于西方中产阶级形成的特征；最后郭教授向 Goodman 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疑惑：根据西方理论，新中产阶级是否要处于反体制状态，中国的民主政治才有希望？



评论嘉宾任远教授指出，从外到内的视角，从新企业家的生活现状来观察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是很有意义的，但任教授也对 Goodman 教授的研究提出了



异议：首先就研究群体而言，新企业家是中国社会人群的很小部分，因此从他们出发研究中国变迁的逻辑仍然有限；其次任教授指出 Goodman 教授未能将“中产阶级”这个概念解释清楚，其中一部分原因归于此概念本身：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中产阶级有不同的定义，但任教授还是建议 Goodman 教授明确指出他究竟在什么意义上讨论中产阶级；同时任教授指出 Goodman 教

授未回答为何中国未出现新的中产阶级，关于这个问题，任教授认为用西方背景下的中产阶级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有局限；最后就方法论而言，关于中国新富阶层与党政关系的实证研究是否有足够代表性仍有待商榷。

David Goodman 对两位嘉宾的评论表示感谢，并在接下来的互动和讨论环节中，对现场老师和同学关于“新中产阶级”的定义问题一一做出回应。



最后，邓正来教授对本次讲座做了总结。邓教授指出 Goodman 教授的讲座让我们意识到用西方概念来研究中国所造成的混乱，为了认识中国本身，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是用中国没有的西方概念是在评判中国还是作中国研究，从而对从一个概念认识中

国时所发生的混乱保持警惕。讲座最后，邓教授再次感谢 Goodman 教授来高研院讲座，也感谢所有现场同学的到来。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王卓娅/文)

三、学术会议

1. “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哲学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



2010年10月21日下午2:00,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与悉尼大学人文学院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2801“通业大讲堂”联合举办了主题为“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哲学与中国研究”的国际研讨会。

来自悉尼大学人文学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新闻学院和经济学院的十几位学者与会, 复旦高研院研究人员邓正来、纳日碧力戈、顾肃、刘清平、孙国东、吴冠军、陈润华、林曦和驻院教授 Philippe Schmitter 参加了本次学术研讨会。

开幕式上, 受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陈立民教授委托, 高研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宣读了他的书面致辞。陈立民教授首先代表复旦大学对悉尼大学人文学院的莅临表示了欢迎。他指出, 复旦大学历来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并且努力引导复旦学者, 产生一大批兼具世界视野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 复旦高研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的, 希望通过复旦学者的点滴努力能够强化中国学者的自主性品格, 提升中国学术的国际化水平。他强调: 在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国际动荡时期, 政治哲学尤为重要。中国虽然没有产生西方意义上的规范性政治哲学, 但是从来不缺乏另一套政治智慧, 作为挑战西方文化形态的另一种文明, 中华文明完全有可能为世界秩序的建构做出贡献。当然, 这首先是有待中国学者去解决的问题。





悉尼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Duncan 教授在开幕式上发表了致辞。Duncan 教授感到很荣幸代表有 150 多年历史的悉尼大学来参加本次研讨会，并向在座中国学者介绍了他的其它十位同事。同时，邓正来教授也向在座悉尼大学艺术学院的学者们介绍本次莅临的中国学者。

本次研讨会共分两个专场。第一场由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David Goodman 教授担任主持人，由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郭定平教授和复旦大学高研院专职研究员顾肃教授分别作主题发言。

以“生存性智慧与中国研究”为主题，邓教授通过引入“生存性智慧”的概念对当代知识研究导向和框架本身进行批判和重构，以期重新发现中国。邓教授主要讲了两方面的内容：首先，他从全球化的性质、世界结构支配性质的变化、社会科学知识的话语特征入手论证了中国社会科学实现走向世界的“知识转型”及重新发现中国的必要性。其次，他介绍了他关于“生存性智慧”的一般观点及其在中国研究中的运用。他强调：“生存性智慧”是知识框架以外的与知识紧密相依和互动的智慧。“生存性智慧”不注重原则，但是有自己的原则（“生存性原则”），不关注普遍价值或道德，而遵循具体价值或道德；它是“去价值判断”或意识形态的，但同时却是以知识和意识形态为伪装或外衣的。如果我们以“生存性智慧”来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晚近 30 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可视为这样的一个过程：“生存性智慧”在关于意识形态的“真假结构”的庇护下、以经济交往中的“熟人交易”和政治交往中的“策略



性行动”为基本形态、以不同层次“生存共同体”的“共同利益”或“共同善”为依据、以经济发展的后果为最高“责任伦理”判准形成的一个“未意图扩展”的历史进程。

郭定平教授以“当代中国发展中的民主政治”为题，用比较政治学的方法揭示了当代中国关于民主与发展的关系。他指出：根据对东亚的研究，在理论上，人们秉

承民主政治-经济发展的冲突论，并且认同这种冲突论在实践上采取相关措施；中国理论界在未经过论证的情况下将这种“冲突论”接受下来，而根据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经验，在实践上则并未遵循“冲突论”的逻辑——因为我们发展民主与发展经济并举。因此，可以用“制度积累和渐进替代”来解释中国实际采取的“政治双轨制”，即在细小制度部件中导入民主自由制度，在为更多人接受之后，逐渐取代落后制度。

顾肃教授阐述的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尊严和公正问题”，以此来表明建构中国的规范性政治哲学要从引入西方政治哲学的话语来规范中国政治哲学转向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他主张，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建构中国规范性政治哲学：首先是继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并使之适用于现代语境；其次是引入西方政治哲学，并使之适用于中国语境；最后根据中国的实践经验，创造适合中国政治哲学的思想、概念和原则。此外，顾教授还以政治哲学中两个最重要的概念——“尊严”和“公正”——为例，简要介绍了其学理渊源及其在中国语境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本场接下来的自由讨论环节中，悉尼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政治哲学教授 Duncan

Iverson, 悉尼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院长 Steven Maras 教授就西方正义原则与中国生存性智慧如何在中国研究中更好地关联在一起, 以及在“重新发现中国”时, 中国学者是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来摆脱西方的影响等问题与三位中国发言者进行了深入交流。

邓正来教授主持了第二场研讨会。悉尼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政治哲学教授 Duncan Iverson, 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院长 Simon Tormey 教授以及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David Goodman 教授分别作了主题发言。

Duncan 教授以“Rawls 之后的正义”为主题对如何超越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进行了探讨。他从平等主义的属性、正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正义与全球正义的关系入手, 通过以公共理性取代社会契约理性, 试图确立有别于 Rawls 的崭新的正义理论。具体而言, 就平等主义的属性而言, Rawls 主要针对的是某种基本结构, 因而提出的问题首先是有关整体的社会正义, 而不是个体行为。这种平等主义的属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新自由主义盛行、市场驱动的时代, 不平等的情况愈演愈烈。尽管 Rawls 承认不平等, 但前提是为了使那些弱势群体获得最大利益, 而这里的问题, 正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Jerry Cohen 所说, “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 那么你何以会变得如此富有?” 如果在形成社会制度结构的平等主义和激发个体行为的个人主义之间存在着常态的紧张, 一个社会如何可能是正义的? 因此, 对 Rawls 正义论的第一个挑战是: 如何处理适用于规范整个社会的正义与适用于规范个体行为的正义之间的关系。而 Rawls 之所以不考虑后一种正义, 是因为人们不会被强制对什么是善和什么是善的生活达成一致。就正义和民主的关系而言, 所要提出的问题是: 为何要从超验的正义形式出发而不从实际的行为或者完善的体制作为正义理论的出发点? Rawls 仅把正义和民主限定为一种产品分配及其程序的概念, 这是不完全的, 因为这两个概念中还有影响产品生产和循环的那个重要背景, 即被公平地、有尊严地对待, 而不是蒙受羞辱。就社会正义与全球正义而言, Rawls 对全球正义表示质疑。这种质疑的基础是一种契约至上的实践理性: 市民有国家、民族之分, 而全球正义恰好反对的就是这种社会契约理性, 并且用那种将正义和民主关联在一起的公共理性来取代它, 这在 Rawls 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Simon Tormey 教授以“共产主义究竟发生了什么?”为题, 分析共产主义为何会在西方复苏, 以



此引出“新共产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异，并得出结论说即使许多反对共产主义的人们在参与社会运动，并且寻找实现人类幸福的路径，但这仍然是要以一种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为前提。他认为，当下世界诞生了新共产主义，其代表人物有 Zizek, Holloway。它不可被解释为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其特点在于：首先它对当代的资本主义作出了尖锐的批判，认为有人性的、能实现社会民主的资本主义是自相矛盾的；其次资本主义不会给出意义，因为它不是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体系，不会解释“自我”，不会告知世界如何联合在一起而不是敌对，这使得西方的个人主义盛行，而这种支持普遍主义和指出实现人类幸福路径的新共产主义是能提供意义的和克服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例如 Holloway “概化的即普遍的能动者 (generalized ,universal agency) 观念”，Zizek “知识分子计划”和 Badiou 的“政治计划”。但是这种新的共产主义也因为没有提出具体的制度设想而受到非议，同时在新共产主义与实际的社会运动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错位——也就是说那些参加社会运动的人常常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但尽管如此，以普遍主义为前提的共产主义仍然是实现社会福利和人类幸福的前提。

David Goodman 教授以 “The State in Transition: Local Perspectives on Change in China ” 为题，通过在中国局部地区进行的实证调查，对持有“中国政治没有变化”的西方学者观点作出反驳，并从六个方面考察了中国的“国家”概念，从而纠正用西方的“国家”概念来定义中国的“国家”时所产生的诸多误解。具体而言，这六个方面分别是，去中央集权的，区域性的意识形态；由有财富实力的企业家和有专业知识的经营构成的社会基础；在整体方面，地方政府财政从依靠中央到依靠当地企业，具有很大的自主权，同时带来更多的腐败和不负责任；中央政府将经济和部分政策决定权放归地方，逐步完成去集权化；以及社会福利不再仅由官僚机构提供，而更多是依赖于社会组织和地方乡镇；以及更开放的外交策略。由此，他可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国家着重于民族主义，并且越来越去中央集权化。但却很少证据证明中国的共产主义终结了。





在本场自由讨论环节，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韦森，复旦大学高研院专职研究员顾肃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驻院教授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复旦大学高研院专职研究员吴冠军博士就全球正义的可能性、新共产主义与传统共产主义在何种意义上归属于共产主义这个概念等问题同三位发言人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最后，邓正来教授代表复旦大学高研院与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David Goodman 共同签署了合作协议，并对各位学者的精彩发言和回应以及广大同学的积极参与表示感谢。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王卓娅 / 文）

2. “全球化时代：两岸社会科学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圆桌会议举行

应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之邀，台湾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以下简称“蒋经国基金会”）董事长毛高文先生携两岸学术访问团一行 14 人于 2010 年 10 月 22 日访问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为“高研院”），并与高研院联合举办了“全球化时代：两岸社会科学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圆桌会议。



10 月 22 日上午 9 点，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在复旦大学光华楼金厅会见了毛高文先生和台湾学术访问团的成员。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和复旦大学历史系分党委书记金光耀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会见时在座。秦绍德书记向毛高文先生简要介绍了复旦大学的历史与现状，并特别介绍了复旦高研院和文史研究院的发展情况；毛高文先生也介绍了蒋经国基金会的成立背景、主旨和本次两岸学术访问团的成员。宾主双方互赠了礼品，并就未来的学术合作事宜进行了初步的商谈。

9 点 40 分，由复旦大学高研院和蒋经国基金会共同举办的“全球化时代：两岸社会科学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圆桌会议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 2801 “通业大讲堂”举行了开幕式。蒋经国基金会董事长毛高文先生及夫人，蒋经国基金会执行长、台湾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为“中研院”）政治学所特聘研究员朱云汉教授及夫人，中研院院士、新竹清华大学人文社会中心主任黄一农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中研院民族所所长、特聘研究员黄树民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中研院近史所特聘研究员陈永发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特聘研究员黄进兴教授，台湾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赵永茂教授，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中心主任、中研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章英华教授，蒋经国基金会副执行长、台湾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员王璦玲教授，蒋经国基金会蒋经国图书馆筹备小组执行秘书杨翠华

女士，蒋经国基金会研究室主任宋翠英女士，蒋经国基金会秘书处专员庄玉娟女士，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潘世伟教授，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杨志刚教授，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任远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研究员，同济大学哲学系主任陈家琪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萧延中教授，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姜义华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法学院孙笑侠教授，以及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邓正来教授、纳日碧力戈教授、顾肃教授、刘清平教授、陈润华博士、孙国东博士、吴冠军博士、林曦博士等出席了开幕式。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校长邓正来教授首先发表了致辞。他对蒋经国基



金会两岸学术访问团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对特地前来参加本次圆桌会议的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潘世伟教授、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杨志刚教授以及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的诸位同仁表示了衷心地感谢，并代表复旦高研院预祝本次圆桌会议圆满成功。

受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陈立民教授委托，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杨志刚教授宣读了他的书面致辞。在致辞中，陈立民教授首先代表复旦大学对蒋经国基金会的莅临表示了欢迎。他指出，复旦大学历来重视与台湾地区的文化学术合作，作为中国文化的共同传承者，两岸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方面有着共同的历史使命。而蒋经国基金会也旨在以严谨的学术立场支持并促进世界各国学术机构对中华文化的研究以及彼此间的交流与合作，从而使国际社会能够对中国文化有更为充分的了解。正是这种对中国文化的共同情感和使命，让我们最终走在了一起。因此蒋经国基金会应宋庆龄基金会的邀请来访复旦，并与复旦高研院联合主办本次圆桌会议，既是蒋经国基金会与复旦加强交流的开始，也必将促进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学术合作。



蒋经国基金会董事长毛高文在开幕式上发表了致辞。他在致辞中讲道，蒋经



国基金会成立已有 21 年。其秉承的一个理念就是“走纯学术的路，支持世界各国有关中华文化和汉学的研究”。在过去的 20 多年中，基金会已经在国际上建立了相当的地位。基金会组织了台湾学术访问团来参加本次圆桌会议，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两岸的专家学者能够找到共同的兴趣点，找到可以共同参与研究的题目。基金会很希望在这些共识之下能够赞助这些研究

计划。毛高文董事长特别指出：“中华文化长久发展以来，尤其是汉学，是由世界各国的专家在给出定义，是从西方人的视角来看我们中国、看中华文化。今天我认为时间到了，两岸的学者应该通过讨论，自己来确定汉学的定义。中华文化应该有我们自己来主导研究。这是将来的一个必然趋势。今天我们很希望通过交流得到共识，由两岸学者共同来研究中华文化。让中华文化从中国人的角度来发扬光大。今天的研讨会是一个开始。”

邓正来教授对与会领导的致辞表示了感谢，他代表复旦高研院与毛高文先生互赠了礼物。开幕式的最后，邓正来院长邀请蒋经国基金会执行长、中研院政治学所特聘研究员朱云汉教授担任复旦大学高研院的学术委员，并代表高研院向朱云汉教授颁发了聘书。



本次研讨会共分上午、下午两场专题讨论。第一场专题讨论由蒋经国基金会执行长、中研院政治学所特聘研究员朱云汉教授担任主持人。首先，他对毛高文董事长致辞中所提出的“时候到了”做了三个层次的解读：第一，两岸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现在应该跨入一个新的阶段，从一般的交流进入深层次合作的阶段，逐渐建构一个包括两岸、香港、海外华人的一个学术社群。而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两岸的交流已经非常密切，基础已经建立。第二，两岸社会都经历了战后 60 年剧烈的社会结构变化，走过崎岖的现代化道路。现在是一个适当的时机，两岸学者可以心平气和的重新理解、诠释、总结中

国过去 100 多年走过的现代化道路。第三，人类发展的历史也到了一个特殊的时刻，必须认真面对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的飞速



崛起的历史变迁。这种变迁需要被重新认真的思考和探讨，它关系到中国 13 亿人口、全世界 60 亿人口应如何在一个资源有限的地球上和平共处，维持生存发展起码的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这是对全球秩序、政治体制和价值观的挑战，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朱云汉教授指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为世界提供了不可多得资源与经验教训，为我们提供了思想价值制度的框架和思考的诸多元素，这正是本次圆桌会议两岸学者应该共同探索的主要课题。

在第一场专题讨论中，台湾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赵永茂教授做了题为“二十一世纪两岸政治学的共同挑战和机会”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强调了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社会科学跨领域合作与整合的重要性以及跨国合作的必要性。



他提出，要用批判的视角来看待“华人时代”的来临，同时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要勇于承担在环境、资源等国际问题中的责任与义务。台湾中研院院士、中研院民族所所长、特聘研究员黄树民教授做了题为“谈社会科学在多元社会能扮演的角色”的主题发言。他指出，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从单元社会向多元社会的转变，社会的复杂性日益增强；实现多元社会的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单靠行政命令是行不通的，社会科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潘世伟教授围绕本次圆桌会议的主题发表了几点重要的看法。他提出了全球化时代知识界所面临的三重困惑，即如何来对待传统学术，如何对待来自外部的知识体系，如何应对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变化、参与到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实践中去。潘教授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界目前是国学、西学、马学并立的局面下，

三学应互相取长补短，实现创造和发展。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做了题为“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的发言。他指出，中国的社会科学要真正取得在全球化时代的发言权，所面临的问题并非资格问题，而是能力问题。如何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进行知识转型，将中国社会科学从150多年来的西学支配中解放出来是两岸学者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邓教授认为，两岸学术交流与合作要实现真正的、本质上的突破，有三大问题需要面对和解决：第一，如何解释和论证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现代化及其“崛起”；第二，如何解释和面对非西方社会的整体性崛起；第三，如何构建一个新的文明体系替代17世纪以来以威斯特法利亚条约为基础的旧文明体系，以应对未来世界的发展。邓教授指出，这三个问题将是两岸学者在确定共同研究课题方面的重要参考。



在本场专题讨论的自由讨论环节，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萧延中教授，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姜义华教授，同济大学哲学系陈家琪教授，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中心主任、中研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章英华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特聘研究员黄进兴教授，复旦高研院林曦博士，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教授等就对于“西学”和“马学”的正确认识、社会科学的哲学训练、中国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发言权以及社会科学的跨学科整合等问题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座的两岸学者畅所欲言，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

第二场专题讨论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担任主持人。



台湾中研院院士、中研院近史所特聘研究员陈永发教授做了题为“通过历史资料检验的近现代史”的发言。他指出，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对认识中国发展的现状与未来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要通过真实历史资料的检验来心平气和、客观地认识大陆和台湾的近现代史。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中心主任、中研院社会学所

研究员章英华做了题为“海峡两岸社会转型的比较：与社会学的对话”的发言。他认为，台湾和中国大陆的现代化转型分属两种不同的类型，台湾为演进式的快速发展模式，中国大陆则是压抑后的加速发展模式；同时，由于共同的文化基础等原因的影响，二者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家庭的运作，家庭作为社会福利的单位，宗教的运作等问题上又有着共同点。对二者的比较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姜义华教授做了题为“民国档案与文献搜集与研究的两岸合作”的发言。他提出，在现有的两岸文献交流与合作中存在着文献开放程度过小、民间档案流失严重等问题。要重现真实的历史，两岸必须建立专门的机构、筹集资金、培养年轻的学者团队来推进对档案文献的整理、交流与共享工作，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提供坚实的历史学基础。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研究员做了题为“两岸国际问题研究发展趋势”的发言。他对两岸的国际问题研究现状与趋势进



行了比较分析：在过去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大陆的研究一般趋向于全球性、历史性的重大问题，而台湾则倾向于细致、微观的问题研究；与台湾不同，大陆的国际问题研究中西方理论流派不占主导地位；在学理上台湾的国际问题研究更为严谨、完整，而大陆的研究则具有更强的战略性。近年来，两岸研究全球问题研究的共同议题越来越多，视野的宽度也越来越接近，尤其

在国际组织、海洋问题、新产业布局、人口和人才流动等问题的研究上有着很大的合作空间。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做了题为“网络信息时代两岸社会科学界的对话与合作”的发言。他指出，中国大陆与台湾息息相



关，两岸学者应一起思考共同面临的问题。同时，中国大陆的社会转型正处于关键时期，拉美、东欧、尤其是台湾的经验和教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岸社会科学界的对话与交流无疑对于两岸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本场专题讨论的自由讨论环节，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法学院孙笑侠教授，台湾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赵永茂教授，复旦大学高研院纳日碧力戈教授、顾肃教授、陈润华博士、刘清平教授等分别就两岸法学界交流的现状与未来、如何看待民族国家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应如何来阐释中国社会、如何认识中国的文化与传统等问题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又讯：22日中午13:20，复旦高研院与蒋经国基金会学术访问团在光华楼东主楼2812“思想者学苑”进行了学术合作座谈会。蒋经国基金会学术访问团全体成员，高研院长邓正来教授以及高研院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顾肃教授、纳日碧力戈教授、张乐天教授、孙国东博士等出席了座谈会。双方就合作的议题、方式、切入点以及对青年学者的培训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与商谈。



据悉，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成立于1989年，其宗旨在于以严谨的学术立场，奖励支持世界各国学术机构与学者对中华文化的研究，并促进国内外的学术机构进行交流合作，期望藉而使国际间对我国的社会文化有更为充分的了解。本次受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邀请来访大陆，复旦大学高研院是其驻上海期间唯一进行访问的学术机构。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王晨丽/文)

四、学术出访

1. 邓正来教授应邀到意大利东方大学讲学并出席“全球治理中市民社会的角色”国际学术论坛

2010年9月20日-10月6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应邀到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讲学。讲学期间，他应邀为意大利东方大学做了一场题为“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的讲座，并参加了由欧盟委员会、欧盟安全研究所（EUISS）、联合国大学比较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等联合主办的“全球治理中市民社会的角色”国际学术论坛，在论坛上做了题为《‘生存性智慧模式’：对既有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既有理论模式的检视》的主旨发言。

2010年10月4日，邓正来教授在意大利东方大学做了题为“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的英文讲座。讲座由东方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主持。

东方大学副校长特地前来致欢迎辞并认真听了演讲。同时，孔子学院院长和多位教授、学生也参加了本次讲座。

在讲座中，邓正来教授主要谈了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他介绍了自身关于全球化的研究，并建构了一种“开放性全球化观”。邓教授强调：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同质化进程，也不是一个只有客观维度的历史进程，而是一个可以根据人的认识、利益、传统等被建构或重构的博弈进程。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而言，只要我们拥有关于中国和世界发展的

“理想图景”，全球化其实是一种机遇。其次，邓教授结合中国社会科学百年来的发展状况分析了其所面临的当下主要使命。全球化的话语建构和话语争夺维度在根本上为中国社会科学以自己的努力建构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和文化政治需求的全球化话语提供了机遇。从中国社会科学历时性的发展来看，它应当从引进、复制、与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知识转型”的新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进行实质性对话的阶段。最后，邓正来教授勾画了制约当下中国社会科学几大瓶颈及中国社会科学“知识转型”的主要方向。他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至少要完成三个主要任务：一要突破“西



方化倾向”，确立中国社会科学相对于西方文化的自主性；二要突破“唯学科化倾向”，确立交叉学科甚或“无学科”的研究方法；三是要打破狭隘的知识地方主义，走向知识的全球化。



在演讲的讨论阶段，在场的教授和研究生纷纷提出问题，邓正来教授一一认真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最后，讲座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2010年10月1日—3日，邓正来教授应邀参加了由欧盟委员会、欧盟安全研究所（EUISS）、联合国大学比较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等在布鲁塞尔联合主办的“全球治理中市民社会的角色”国际学术论坛。在论坛上，他和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秘书长 Martin Westlake、英国华威大学（Warwick University）教授 Jan A. Scholte 等一道做了主旨发言。在题为《‘生存性智慧模式’：对既有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既有理论模式的检视》的发言中，邓教授在对“市民社会反抗国家理论模式”、“市民社会理论模式”、“三部门理论”、“法团主义模式”、“分类控制体系”模式等理论模式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生存性智慧”模式的设想。在他看来，既有理论模式多具有如下缺陷：第一，由于秉承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路径，有利于把握中国市民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但却不能站在中国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高度而建构未来；第二，就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现状的把握来讲，该理论模式也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即过于看重行政管理层面正式法规对市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而对政府当局对待社会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实际政治立场缺乏充分的关注；第三，就我们对中国市民社会组织的现状把握和未来建构来讲，该模式实是一种唯理主义模式，看不到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所达致的那种“未意图的扩展”过程及其对中国市民社会建构的可能意义。他认为，就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而言，要把握如下几点：第一，我们必须看到市民社会理论模式本身所具有的限度；第二，我们必须以“关系性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市民社会问题，在“世界结构”中，把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与中国的主体性及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要求结合起来；第三，即使我们坚持“市民社会理论模式”的基本要求（即民主转型的需要），我们也应当在西方自由民主模式之外拓展中国民主转型的想象空间。就市民社会研究而言，“生存性智慧模式”的基本理论预设是：由于统治体系内部的利益分化、政府失灵，特别是统治体系本身的“理性有限”

和中国人特有的“生存性智慧”的实践运行，市民社会组织有可能在当下的分类控制体系中“未意图扩展”，进而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独特的、符合“中国理想图景”要求的市民社会发育及民主转型模式。

在东方大学讲学期间，邓正来教授还与该校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和孔子学院的相关学者等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孙国东/文）

2. 邓正来教授在第一届亚洲人类学民族学论坛做主题演讲，纳日碧力戈教授主持第一届亚洲人类学民族学论坛开坛

第一届亚洲人类学民族学论坛 2010.10
First Asian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Forum



2010年10月9日至1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室承办的第一届亚洲人类学民族学论坛在京召开。来自日本、韩国、蒙古、泰国和澳大利亚的12位国外学者和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厦门的26位国内学者，聚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会议厅，在论坛上发言并参加讨论。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发表了题为“‘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研究论纲”的主题演讲。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教授主持了开坛演讲，并以“景观的三元勾连与生态物性”为题目做了大会发言。



3. “雄楚学坛”正式启动，邓正来教授亲赴参加

近日，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发起成立、专门联络



武汉地区青年学者的“雄楚学坛”正式启动。2010年10月16日晚七点半，“雄楚学坛”开幕式暨珞珈政治学论坛在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成功举行。邓正来教授亲赴武汉参加了开幕式，并做了开坛讲话。

论坛由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储建国教授主持，参与会议的学者有：武汉大学的申建林教授、刘伟副教授、付小刚老师，华中师范大学的贺东航教授、慕良泽老师，华中科技大学的成凡教授、董慧副教授、郭亮老师、郭小安老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万健琳老师、孔凡义老师，武汉理工大学的黄岭峻教授以及华中农业大学、中南民族学院等高校的青年教师和广大学生。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张星久教授代表东道主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致欢迎辞，对邓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他发起的雄楚学堂表示赞赏和支持，希望邓教授能给青年教师更多的指导。

邓正来教授做了开坛致辞。在致辞中，邓教授阐述了他倡议设立雄楚学坛的原因：一是因为他认为中国目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门户之见越来越严重，偏见存在于学科与学科之间、存在于学校与学校之间，阻碍了青年学者之间的正常学术交流；二是他自己特别喜欢年轻人，期待年轻人有追比圣贤之心；三是尝试打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科壁垒，为中国社会科学的真正发展做出真正的贡献。邓教授希望湖北的青年才俊与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保持更为紧密的联系，并希望雄楚学坛能够团结更多的年轻人，给全国的青年才俊做出表率。



开幕式之后，雄楚学坛首次论坛正式开始，主题是“乡村秩序的地方性与国家性”。主题发言者分别是武汉大学的刘伟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的慕良泽博士，华中科技大学的成凡教授、郭安博士，中南民族大学的彭庆军老师。在发言中，

各位学者阐述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刘伟副教授试图在村庄层次透视乡村秩序的地方性与国家性，探讨乡村秩序的内在结构及其内部互动机制；慕良泽博士根据自己在青海藏族乡村的调查经验，分析了少数民族基层治理中民族性与国家性之间的关系；郭亮博士根据对江汉平原S镇农村地权纠纷的调查，试图解读地权纠纷背后的地方性与国家性观念的冲突，尤其是地方化了的传统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现代化观念之间的冲突；成凡教授从乡村建设派办学院的失败，反思了中国学术研究体制的国家性与民间性的关系问题；彭庆军老师则对刘伟老师提出的分析框架进行了补充，并提供了经验性的支持。在自由发言阶段，与会者就四位发言的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自由发言结束后，华中师范大学的贺东航教授做了点评。

最后，邓正来教授就这次论坛做了总结。他希望雄楚学坛能坚持办下去，并表示有时间再来与武汉的青年学子一起讨论。论坛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据悉，“雄楚学坛”是邓正来教授今年六月访问部分武汉高校期间与部分武汉青年学者座谈时发起成立的。为激励武汉青年学者克服校际论坛举办的困难，邓教授个人资助了第一次论坛的费用。同时，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亦将采取一系列制度化的措施促进“雄楚学坛”蓬勃发展下去。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孙国东/文）

4. 邓正来教授应邀参加德国弗莱堡大学高研院举办的世界高等研究院学术论坛



2010年10月25-27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应邀参加德国弗莱堡大学高研院举办的《全球视角中的世界各国大学高等研究院：期待、挑战、新领域》学术论坛，并在论坛上作了题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注重跨学科研究”的专题报告。

邓正来教授在报告中介绍了复旦大学高研院的创院背景、理念、使命及主要学术活动,并重点阐述了他关于新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跨学科研究的时代要求、研究路径和三个必要条件:跨越西方化的制约以建立中国学术标准和自主性;打破学科壁垒以进行跨学科研究;挣脱狭隘地方主义文化视野以采取世界主义和全球化视野来研究中国问题,并探求其理论和方法的世界普遍意义,从而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和中国经验的深度研究相结合,以中国化的学术成果与西方进行实质性的对话,不仅丰富和发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而且以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学术成果对世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作出贡献。邓教授的发言引起与会代表的热烈反应和讨论。

本次学术论坛参会者来自世界各州17个国家32所世界著名大学高等研究院的院长、副院长或他们的代表。德国弗莱堡大学校长到会致辞并在第一天晚上举行欢迎酒会祝贺会议成功召开,弗莱堡所在州的科技部部长也应邀参会并发表了题为“德国培育学术卓越和国际合作的政策”讲话。会议期间,与会者就以下专题开展了深入的探讨:世界高研院的发展和前景、二十一世纪的挑战和理念、高研院制度设计和跨学科交流、人文社会科学高层次研究、高校如何建构跨学科交流、学术自主、学术卓越的学术环境、知识生产方式和方法、政府和学校对高研院发展的资金支持等。



会议期间,邓正来教授和随行参会的复旦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还与德国弗莱堡大学高研院校长及参会的各国高研院校长、副院长或其代表开展了广泛的交流,探讨院际间交流和合作的领域和方式,并初步确定明年2011年夏季在复旦大学召开世界人文社会科学高研院国际学术会议。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郭苏建)

5. 邓正来教授应邀参加中欧法学院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

10月23日-24日，主题为“法律的作用（The Role of Law）”的中欧法学院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诺富特和平宾馆举行。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应邀参加了该次会议，并在会议第三单元“法学教育：使命、机构和挑战”发表了题为“关于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若干问题”的演讲。



本届研讨会的主题为“法律的作用”，为期两天，涵盖5个讨论单元，重点讨论了法律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法律在欧洲社会的作用、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等方面的问题。欧盟驻华代表团副团长 Michael Pulch 先生、中欧法学院联合管理委员会中方主任及司法部前部长张福森先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先生等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致辞。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中欧法学院联席院长方流芳、中欧法学院联席院长高美莲、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清华大学教授王晨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景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龙卫球、著名律师张思之以及来自德国汉堡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等高校的外籍学者共计数十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孙国东）

6. 纳日碧力戈教授参加在韩国高丽大学举行的国际会议



10月14-16日纳日碧力戈教授赴首尔参加由高丽大学价值与伦理中心和东亚研究所主办、在该校校友会大厅举行的“无需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国际会议并选读论文“无需文化同质的空间中国：一个理想的出路”。会议由高丽大学价值与伦理中心主任、东亚研究所所长 Jun-Hyeok KWAK 博士主持，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学者参加会议并选读论文。

7. 纳日碧力戈等教授参加“边疆发展中国论坛”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高研院专职研究员纳日碧力戈教授参加2010年10月23-24日在北京举办的“边疆发展中国论坛2010”，以“发展、保持和恢复——基于生命活动的辩证观”为题发言并担任“民族发展专题”小组评议人。本次论坛由中央民族大学主办，支持单位有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国家民委教育科技司、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民族发展研究所。复旦高研院特聘讲座教授、双聘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兼副主任王铭铭教授以“民族地区人类学研究的方法与课题”为题发言并担任“发展理念专题”小组评议人；复旦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创始委员、复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汪晖教授担任“发展理念专题”小组评议人。

教授、双聘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兼副主任王铭铭教授以“民族地区人类学研究的方法与课题”为题发言并担任“发展理念专题”小组评议人；复旦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创始委员、复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汪晖教授担任“发展理念专题”小组评议人。

8. 纳日碧力戈教授在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举办讲座

2010年10月27日纳日碧力戈教授应邀分别在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国际讲坛和人类学系发表讲演，题目为《民族国家的人类学研究》和《盖尔纳民族国家理论前沿》。28日纳日碧力戈教授在曾少聪主任陪同下参观了南靖土堡。



9. 纳日碧力戈教授参加庆祝中国民族学学会成立30周年——中国民族学学会第七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学术研讨会



2010年10月29-31日，纳日碧力戈教授参加在武汉中南民族大学举办的庆祝中国民族学学会成立30周年——中国民族学学会第七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学术研讨会，在第一小组以“文化自觉：中国民族学的当下任务”为题宣读论文，担任该小组第四场的评论人并当

选中国民族学学会第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10. 菲利普·施密特教授 (Philippe Schmitter) 9月在吉林大大学、南开大学演讲并参加在南开大学举行的研讨会

国际著名政治学者菲利普·施密特 (Philippe Schmitter) 教授于 2010 年 9 月开始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驻院教授。高研院专门为他安排了国内高校的学术巡讲活动。巡讲的第一站和第二站分别是吉林大学和南开大学。

2010 年 9 月 6 日上午, 菲利普·施密特教授 (Philippe Schmitter) 在吉林大学中心校区东荣大厦为该校师生做了一场题为“民主化与国家效能之间的关系”的学术讲座。此次报告由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和吉林大学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联合举办。

菲利浦·施密特教授对于“民主化”和“国家效能”这两个概念进行阐述, 并结合现代化讲述了民主化与国家效能之间的关系。他还进一步从国际比较的角度介绍了几个发展模式。在对本次讲座的主题进行总结时, 他强调从长期来看, 民主化可以增强国家效能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 使公民可以自愿自主地加入到政治过程中。



9 月 24 日下午, 菲利浦·施密特教授给南开大学的师生进行了一场学术讲座。25 日, 施密特教授还参加了在该校举行的“中国政治研究·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他在会议第三场“中国政治研究的方法论”英文专场做了题为“The Design of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in China and Elsewhere”的主题发言。据悉, 本次研讨会共有五个专场, 主题分别为中国政治的特点、中国政治的发展、中国政治研究的方法论(英文)、中国政治及跨学科研究、中国政治研究及方法。

菲利浦·施密特教授还将在国内其他高校进行巡讲活动。目前确定 10 月在复旦大学进行第三场演讲, 11 月初在浙江大学进行第四场演讲。

11. 高研院部分成员应邀参加“世博”澳大利亚国家馆举行的圆桌会议

2010年10月27日，应2010年上海世博会澳大利亚政府总代表萨琳德女士的邀请，高研院专职研究员林曦博士、孙国东博士、吴冠军博士及外事助理舒彩霞代表高研院出席了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澳大利亚国家馆举行的“中国研究课题中的澳中合作”圆桌会议。



首先，萨琳德女士致欢迎辞。之后，澳大利亚驻华大使 Geoff Raby 博士发表了圆桌会议的开幕词。他指出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关系密切，长期以来在多个领域进行了合作和交流，开展中国研究对澳大利亚来说具有高度的必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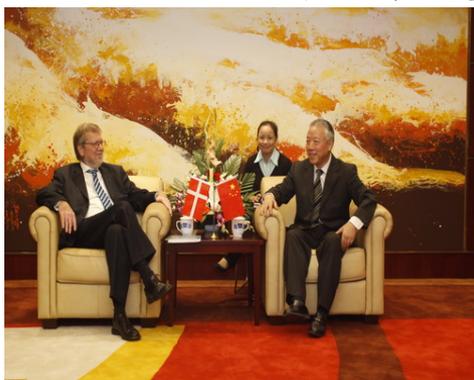
本次会议共分为上下两场。第一场主题为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 in Australia)，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悉尼大学、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The China Studies Association)和西澳大利亚大学的四位学者分别发言，并回答了其他学者提出的问题。第二场主题为中国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 in China)，来自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的四位学者作了发言。林曦博士等就讨论主题提出了问题，引起在场学者热烈的讨论。圆桌会议结束后，主办方热情地带领与会人员参观了澳大利亚国家馆。



五、学术来访

1. 丹麦文化部部长 Per Stig MØller 一行来访复旦高研院，“文化在当今和未来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研讨会举行

2010年10月21日，丹麦文化部部长 Per Stig MØller、丹麦驻中国大使 Friis Arne Petersen 一行七人来访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为“高研院”），并参加了“文化在当今和未来中国社会中的作用”（The Role of Culture in the Chinese Society Today and in the Future）研讨会。



21日上午10点，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先生在光华楼红厅会见了丹麦文化部部长 Per Stig MØller 率领的访问团。秦绍德书记对丹麦文化部部长 Per Stig Møller 一行来访复旦大学表示了热烈欢迎，向 Per Stig Møller 部长简要介绍了复旦大学的历史与发展近况，并希望与丹麦高校及其它文化机构建立广泛的合作联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会见时在座。

上午10点30分，丹麦访问团莅临复旦大学高研院2801“通业大讲堂”，与高研院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纳日碧力戈教授、顾肃教授、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教授、陈润华博士、吴冠军博士、林曦博士、邓正来教授共同参加了“文化在当今和未来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研讨会。邓正来教授首先欢迎了丹麦使团的来访，并向丹麦使团介绍了在座的高研院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和邓正来教授分别作了题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精神与缺陷”和“生存性智慧”的主题报告。

刘清平教授在报告中指出，作为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思潮，与西方强调理性的主流文化相比，儒家更强调情感，认为情感构成了人的本质。儒家思想正是凭借着这种道德情感来建构家庭和社会的和谐秩序。同时，刘教授认为，儒家思想也存



在一些缺陷，其最大的缺陷就是把忠君孝父的情感置于仁者爱人、守法公正的道德原则之上，这与当今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徇情枉法、任人唯亲等现象有着密切的关系。另外，儒家文化在强调私德和小团体公德的同时往往忽视社会公德。更为严重的是，儒学还发展出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要求子女、臣民顺从于父母和君主。刘教授提出，今天的社会中我们应该批判性地弘扬和发展儒学，在强调情感因素、仁爱的同时，要剔除其消极性的一面。只有经过这种创造性的转型，儒家思想今后才有可能继续成为中国文化的支配和主导性力量，对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在题为“生存性智慧”的报告中，邓正来教授介绍了“生存性智慧”的概念。他认为，生存性智慧是指中国人传统文化中一些活的、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智慧，它隐含在中国人的生命中，书本上不一定记载，也非正轨的学校教育所传授。他认为，正是这种生存性智慧，引导着中国三十年的改革与中国未来的发展，其重要性不能被忽视。邓教授特别指出，要了解真实的中国，不仅要看文字记载的中国文化与思想，更应该通过真实地交流与接触来体会中国人对待现实生活的反应方式。中国人的创造性，不是简单的理性与科学，也是本能的、历史的。因而，大家在关注正式层面记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也要关注到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中国文化的意义。



在仔细听取了两位教授关于中国文化的报告之后，丹麦文化部部长 Per Stig Møller、丹麦驻中国大使 Friis Arne Petersen 及其他访问团成员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主要包括：维持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否需要政治体制进行变革？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性化因素？如何在儒家思想的背景下实现社会正义？等等，与在座的高研院学者展开了深入地探讨与交流。



围绕丹麦学者提出的问题，邓正来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看法。他指出，不能盲目信赖西方式的“自由经济必须依赖于自由政治”经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发展已经向我们证明：中国政治的合法性正是建立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要相信中国人有足够的智慧。刘清平教授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理性化的因素，但是不占主导地位。伴随全球化的发展，科学、理性因素的深入势必推动中国人将理性因素与情感因素结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纠偏的作用。刘教授指出，儒家思想比较偏重于君臣之义，如此便引发了情感压倒正义、最终影响社会公正的现象；但是，儒家也讲“仁义”，即与“仁者爱人”联合起来的“义”。弘扬这种“仁义”，同时吸收和学习西方进步的尊重人权、自由和民主的观念，将有益于社会正义的维持和实现。

最后，邓正来教授代表复旦高研院与 Per Stig MØller 部长所代表的丹麦访问团互赠了礼物，会议成员合影留念，本次研讨会圆满结束。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王晨丽/文)

六、媒体报道

1. 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携两岸学术访问团访问复旦高研院

“全球化时代：两岸社会科学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圆桌会议举行

人民网上海频道 10 月 22 日电（记者姜泓冰）应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之邀，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毛高文携两岸学术访问团一行 15 人莅临复旦大学，并与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联合举办圆桌会议，两岸学者围绕“全球化时代：两岸社会科学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的主题展开深入交流。

台湾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赵永茂，台湾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院士、中研院民族所所长、特聘研究员黄树民，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高研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台湾中研院院士、中研院近史所特聘研究员陈永发，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中心主任、中研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章英华，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姜义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等在圆桌会议上做了主题讲演。与会的其他学者围绕主题发言展开积极而热烈的讨论。

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成立于1989年，其宗旨在于以严谨的学术立场，奖励支持世界各国学术机构与学者对中华文化的研究，并促进国内外的学术机构进行交流合作，以期使国际间对中国社会文化有更为充分的了解。

两岸学术访问团聚焦社会科学发展新议题

新华网上海10月23日电（记者俞菟）海峡两岸如何规划学术领域深入合作的新阶段？10月22日，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与台湾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圆桌会议上得到了充分的讨论。

据悉，本次台湾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所携学者共15人，应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之邀来到上海。研讨会主题是“全球化时代：两岸社会科学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从今年开始，基金会与复旦高研院将每年确定一个主题，开展交流合作，共同促进两岸社会科学的多元发展。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潘世伟在题为“中国社会科学的机遇与挑战”的演讲中说：“中国当代学界面临着三重困惑：如何承续传统学术？如何对待西方知识体系？如何解决中国发展的实际问题？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不仅仅要传承中国严谨、丰富的历史传统，更要关注并引导当下的时代变革和群众的实际利益。”

这恰是两岸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不断思考和努力的实践方向。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说：“两岸的学术交流和访问长期以来没有断过，现在迈进深入、立体和成熟的新阶段。我们今后的合作将发生本质上、结构上的变化。在历史责任、当下责任与未来责任三大问题上达成共识，建立非西方世界应对未来世界发展的文明体系。”

“比如我们将严格按照学术规则，共同确立世界未来发展的战略性课题。把两岸优秀的资源整合起来，与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进行实质性的交流与对话。”

台湾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赵永茂说：“很多学科研究的是“躺下的社会”，而社会科学研究的却是“站立的社会”，因为它面向未来的时代。”

我们会反思，为什么很多理论课题投入了很多资金，却在现实危机来临时无所作为？高等教育领域应该启发和引导学生具备什么样的责任感与多元文化认同感？我们希望从科技整合、跨域合作和与时代接轨等角度，加强与复旦大学高研院等大陆院校机构的互动。”

据介绍，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成立于1989年，其宗旨在于以严谨的学术立场，奖励支持世界各国学术机构与学者对中华文化的研究，并促进国内外的学术机构进行交流合作，藉而使世界对我国的社会文化有更为充分的了解。
(完)